

杨作山◎著

HUIZANGMINZUGUANXISHI

回藏民族关系史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2010年教育部资助宁夏大学“211工程”项目
- “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与回族史、西夏史”子项目立项成果之一

回藏民族关系史

HUIZANGMINZUGUANXI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藏民族关系史 / 杨作山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27-05102-2

I. ①回… II. ①杨… III. ①回族—民族关系—民族历史—藏族—研究—中国 IV. ①K281.3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333 号

回藏民族关系史

杨作山 著

责任编辑 杨海军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557

印数 1760 册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102-2/K·77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回、藏民族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从公元7世纪起，波斯、大食文明就对吐蕃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吐蕃商人的足迹也曾遍及中亚各地。宋元以后，随着大批中亚、西亚各国贡使、蕃商和工匠的东来，不少回回人入居甘、青、川、滇藏区，他们带来了以商业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回族商业社区的形成，为回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以茶马、皮毛贸易为主的回藏民族贸易更加兴隆，并逐渐形成了回藏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回藏民族长期共处，在经济上互相联系、相互补充；在文化上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回族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经济，且已发展成为一种地方性经济。在甘青川藏地区，回族对沟通汉藏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促进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在人们的交往联系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社会关系问题”^①。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而对物质生

^①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263页。

产资料的需求又促使民族内部的交往向民族间的交往延伸;同时,各民族居住区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生产分工也使民族间的交往成为必要,这就形成了民族关系。民族是一种具有多重复合结构的特定的社会群体,故民族关系也是多重复合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民族的多维属性决定了民族间的交往既是物质生产的交往,同时又是精神生产的交往。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反映在产品需求上则是一种“非平衡需求”。游牧民族特别需要农耕民族的茶叶、粮食、丝绸和布匹等,但农耕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满足人们相对较低的生活需求,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不大。这就决定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黄河上游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农牧两大区域交错过渡地带,在经济类型上可以分为游牧经济、农耕经济和半农半牧经济。多种经济类型的存在,也反映了本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在青藏高原上,藏族的先民们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采取农、牧分营的经营模式,即一部分人从事种植业,而另一部分人从事畜牧业。黄河上游和青藏高原地区农牧并举的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区域内各民族间经济上的互补。但是,这种有限的农业经济无法满足藏、蒙古等游牧民族诸如茶叶、丝绸、布匹等全部的生活需求。同时,汉藏民族由于受重农抑商思想和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太重视商业,这严重阻碍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回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牧商并举的民族,他们凭借丰富的商业经验、充足的运作资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沟通汉藏民族农、牧经济间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自从回族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立足后,他们与藏族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虽有阶段性,但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回藏民族间交往的范围从青藏高原东部逐步向西藏地区延伸,越来越大;交往的内容从商品交换到通婚以至文化互借,也越来越广泛、深入。

民族贸易是少数民族内部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在青藏高原上,回藏民族间的贸易关系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民族社会关系。回藏民族贸易刺激了蒙藏地区自然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增进了藏、回、汉、蒙古等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青藏高原地区虽然民族成分复杂,宗教形态各异,但回藏民族间业已形成的独特的互补共生模式,构成了这一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砝码。“在当

前世界范围内民族和宗教纷争不断的形势下,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青海高原的友好共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为研究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提供了样板。”^①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政治、经济状况在观念形态上的综合反映,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普遍品格,具有相互借鉴吸收的可能性。西北各民族受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和行业选择上各有侧重或禁忌。一般来说,藏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而回族则从事商业、屠宰业。回族和广大穆斯林已成为藏区社会不可或缺的、互为补充的职业群体。经济交往是民族交往的本质。但是,没有文化上的交流,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也很难深入进行。回藏民族间频繁的经济往来与巨大的文化差异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

西北地区各民族间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展过程不尽相同,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长期以来,回藏民族间在地缘结构上相互渗透,在经济形式上互为补充,形成了独特的互补共生模式,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各族的生存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生产方式上的互补,在本质上是生存手段的互补,随着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藏民族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回藏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调适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民族关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密切相关的变量,它对该地区人民生活的和谐安宁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回藏民族关系史研究概况

1981年5月,由翁独健、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共同倡议发起,在北京香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阐明了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取得了许多共识,它标志着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新起点。此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更加强调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问

^① 罗绒战堆:《西藏商贸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题的整体研究。翁独健先生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阐明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和基本原则。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界对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杨建新、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论述了自先秦到清末西北各民族的迁徙、分布情况;中央王朝对西北诸族的经略以及西北各族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等。周伟洲著《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北民族关系史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论述。杨铭的《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专门探讨了吐蕃与西域、中亚、南亚各国、各族间的关系。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着重论述了西夏与宋、辽、金、吐蕃及回鹘的关系。王辅仁、陈庆英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阐述了13~19世纪中叶即元明清时期蒙古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往来及相互影响。樊保良的《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探讨了13~18世纪蒙藏民族关系发展过程及蒙藏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杨学琛的《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和规律。秦永章著《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以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为经,以各民族的发展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为纬,多视角、多层面地对甘宁青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谢佐主编的《青海民族关系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主要论述了中原移民与青海的汉族;唐蕃关系对青海民族关系的影响;青海地区蒙藏关系;历代中央政府治青政策及青海民族关系的特质等。此外,赖存理著《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洲塔著《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胡厚安、陈守忠著《甘肃古代史》(兰州大

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对我们研究甘青地区民族分布格局和回藏民族贸易有一定帮助。

关于回藏民族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回藏民族贸易方面,且数量不多。周星的《黄河上游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形成》(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一文,就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较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对我们研究回藏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具有启示意义。高占福、蒋新贵的《甘肃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甘肃民族研究》1987 年第 1、2 期)一文,考察了甘肃回族商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王永亮的《西北回族经济活动史略》(《回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一文,则考察了在西北地区复杂的自然、社会条件下,回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马平的《近代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回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对从近代以来甘青川康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中回族中间商历史作用的考察,论述了回族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商贸流通中的“桥梁”作用。张世海的《民国时期安多地区的回藏贸易》(《回族研究》1997 年第 2 期)一文,对民国时期安多地区回藏贸易的规模、品种、贸易方式及其影响作了详尽介绍。高占福的《甘肃临夏和青海东部地区回族的商业贸易》(见《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从历史角度审视了甘宁青地区回族商业发展史。段继业的《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与穆斯林群体的互动关系》(《民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一文,以藏族与回族关系为主线,论证了当代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藏族与穆斯林群体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与穆斯林间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源于他们之间长期、持久和频繁地民间互动,而互动的深层根源则是两种生产方式的互补共生需要。互动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和而不同”才是藏族与穆斯林关系长期的发展趋势。彭武麟《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一文,就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问题包括民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融合;中央政府衰败下的各地自立倾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政治认同等。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孤立的、直线的,而是相互渗透、联系紧密的,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矛盾运动之中的不同侧面。

青藏高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对这一地区族际关系的

研究,历来是民族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藏汉、回汉、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相比之下,对回藏民族关系的研究,因史料匮乏,除了回藏民族贸易这个传统的选题之外,尚无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出现。本书并非想填补空白,只是将已有研究成果做一梳理,抛砖引玉而已。

三、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对回藏民族关系的研究,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回藏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为我们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奠定了基础。本书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为主要研究范围,以回藏(因地缘关系和史料甄别问题,有时涉及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族和蒙古、裕固、土等族)民族为中心,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施政以及茶马贸易、皮毛贸易、民族民间贸易为主线,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阐述回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途径、形式、内容和过程,研究回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特点,总结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规律以及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

本书共分七章,从历史、地理角度全方位探讨回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发展。

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地区就与华北、葱岭以西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西藏西部地区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吐蕃商人将麝香、金银、药物、马匹等销往中亚各地;从中亚销往吐蕃的商品有兵器、衣料等生产生活用品。倭马亚王朝(661~750年)时期,伊斯兰教各派在中亚地区的活动非常频繁。阿拉伯帝国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谓的鼎盛时期,并开始了第二次对外军事扩张。与此同时,吐蕃北破吐谷浑,深入西域、中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食东进的势头。阿拔斯王朝(749~1258年)建立后,在中亚各地派驻大军,并与唐朝、吐蕃形成鼎足之势。“安史之乱”后,唐朝不仅无力经略西域,而且将安西、朔方等地驻军调入内地,镇压叛乱藩镇。唐在中亚地区各属国相继臣服于大食。当时吐蕃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吐蕃都成为抵御大食东进的中坚力量。吐蕃在西域、中亚地区的活动,延缓了上述地区伊斯兰化的进程。

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间经过长期的较量与聚合,出现了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西域境内有回鹘人建立的高昌回鹘、喀喇汗朝及契丹人建立的西辽王朝;河西走廊一带先后有张义潮建立的

归义军政权、回鹘人建立的甘州政权和吐蕃人建立的凉州六谷蕃部政权；青海境内则有吐蕃人建立的唃廝囉政权等。这种局面虽然不利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但它为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尤其是藏族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自李继迁叛宋后，传统的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于阗、大食、高昌诸国贡使和行商纷纷改走青海道，致使唃廝囉境内之青唐、林金、邈川等地成为西北贸易中心，蕃商云集。青唐城不仅是唃廝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市场。当时青唐城东居住着大量喀喇汗朝和西域各国穆斯林商人。

13世纪初，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其多次西征，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军士带入中国，并成为蒙古征金、灭夏、伐大理及南宋的重要力量。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及西域回回亲军十万南下，取道甘南藏区进入川西，然后分三路攻取大理。其中兀良哈台率领的西路军从川西经旦当（中甸），渡金沙江至维西、丽江等地，攻克大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随军征战的大批色目人先后进入松潘、阿坝等藏区。元朝建立后，为了确保蒙古贵族对全国的统治，推行亲王出镇制度。一些回回士兵随同亲王和各级官吏镇守藏区。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商人和宗教职业者，从丝绸之路进入甘、青、川、滇及西藏地区。

明朝初年，明军的北伐、西征以及蒙藏势力的迅速衰落，为西北地区回汉民族的发展减轻了压力，拓展了空间。明朝中叶后，国力日衰，边疆不稳。正德初年，蒙古亦不剌、阿尔秃厮部徙居青海；嘉靖万历年间，俺答汗占据西海。蒙古诸部移牧青海，不仅冲破了明朝隔绝蒙藏的边防体系，而且打破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加速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步伐。明代是回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西域贡使和商人大批来华及回回人口的增加，回族遍布甘青川滇藏各地，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基本形成并趋向定型化。

有明一代，回汉民族与蒙藏诸族间的民间贸易通过“合法”和“非法”两个渠道进行。民间的“合法”贸易在民族经济联系当中的作用，远胜于官方的朝贡贸易和茶马贸易，但这种贸易无论在商品的种类、数额，还是在贸易的时间、地点方面，都受到封建政府的种种限制。正因如此，“非法”的民间贸易便应运而生，并在民族贸易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明末清初，官办的茶马互市因“私茶”的盛行而难以为继，相反，民族民间贸易以其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得到长足发展。在以农、牧产品交换为主的汉藏贸易活动中,回族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朝前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蒙藏等少数民族被纳入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清廷尊重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承认蒙藏民族的民族特点,肯定其民族上层对本民族的统治权。然而,清廷对回族除承认其宗教习俗外,并不承认其在政治上有特殊性。各地回族分别归各州县管辖。清军入关后,各地回族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反清斗争。在西北地区,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回汉民众相继逃亡甘青藏区,与蒙藏民族杂居。雍正年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河、凉、甘州等地部分回民移居青海东部地区。雍正十三年(1735年),茶马互市停止后,由河湟地区回族主导的群众性的回藏民族贸易迅速崛起,规模空前。西宁、丹噶尔、凉、甘、肃、河、洮州等地,成为回藏民族贸易的主要场所。乾隆年间,清政府曾两次用兵大、小金川。战事结束后,有不少内地回族士兵屯驻于此。同治年间,清廷对西北回族的疏散政策对回族居住区域以及回藏民族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致使少数民族地区手工业作坊大量倒闭,在经济上逐渐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清末民初,随着我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羊毛贸易的兴起,西北地区回汉蒙藏诸族,打破地域界限,克服重重困难,纷纷从事羊毛贸易。大批回汉商人深入柴达木盆地蒙古游牧区和果洛、玉树藏区,收购羊毛;蒙藏诸部牧民也携带皮毛和各种土特产品,前往西宁、丹噶尔、河、甘、凉、肃州等地,进行交易。伴随着民族贸易的发展,西宁、肃州、河州等地逐渐发展成为民族贸易中心城市。这一时期,回族内部还形成了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商业的商人阶层,他们有倾倒地方的官僚巨商和商业资本家,也有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几乎整个民族都参与到了回藏贸易当中。回族商人在藏区各商业城镇及周边地区安家立业,逐渐形成新的回族商业社区。回藏贸易的发展和新的回族商业社区的出现,奠定了回族在广大藏区的分布格局。

民国时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边疆危机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民国中央政府在“民族同化”和“兴办实业”的民族政策下,沿袭和发展了一套原有的边疆民族政策和民族管理机构。这些民族政策从主观上来说,虽无不代表统治阶级

的意志和利益,但从客观上来看,对于协调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关系,稳定边疆地区,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后,马麒集团占据青海,马福祥家族统治宁夏,马安良则坐镇兰州,形成了诸马家族主政甘宁青地区的地方政权局势。马家地方政权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回族上层的政治地位,改变了西北回族内部的社会结构,而且为西北回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某些契机,对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二次变迁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在民族关系上,川甘界争的顺利解决,果洛地区的稳定,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在客观上起了抵制英国入侵青海的积极作用。诸马家族与西藏的贸易是青藏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这种贸易带有军事扩张性、经济掠夺性和垄断性,但它对于沟通内地与西藏间联系具有积极意义。当然,马家军阀在青海镇压藏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做法,则损害了回族与其他各民族间的关系。

目 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吐蕃与大食政治经济关系 / 001

第一节 吐蕃西向与大食东扩 / 001

第二节 吐蕃东渐与河陇地区的吐蕃化 / 013

第二章 唃廝囉时期的蕃商与蕃客 / 036

第一节 北宋时期的秦州路与河湟路 / 036

第二节 唃廝囉与丝绸之路 / 046

第三章 蒙元时期回藏民族关系 / 062

第一节 蒙古南征及回回人入居藏区 / 063

第二节 西北藏区蒙古诸王与伊斯兰教 / 068

第三节 元代回藏民族经济往来 / 078

第四章 明代回藏民族关系 / 086

第一节 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初步形成 / 087

第二节 关西七卫的废置与伊斯兰教的东传 / 100

第三节 明代回藏民族经济往来 / 126

第五章 清朝前期回藏民族关系 / 137

第一节 蒙藏回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 / 137

第二节 回藏民族经济交往的加深 / 162

第六章 近代回藏民族关系 / 183

第一节 回藏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 184

第二节 西藏的穆斯林及回藏民族关系 / 193

第三节 回藏民族贸易的兴盛与转型 / 219

第七章 民国时期回藏民族关系 / 236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 / 237

第二节 马麒对藏政策及其作用 / 245

第三节 回藏民族贸易的发展与城镇的兴起 / 255

第四节 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 / 279

第五节 回藏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 / 289

参考书目 / 302

后 记 / 307

第一章 吐蕃与大食政治经济关系

早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上的先民就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起,随着吐蕃与大食的崛起,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吐蕃、大食三方关系史构成了7世纪中叶迄9世纪初叶亚洲政治史的主要内容。研究吐蕃与大食关系,是我们研究回藏民族关系史的第一步。

第一节 吐蕃西向与大食东扩

一、吐蕃与大食早期关系

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地区就与华北、葱岭以西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西藏“西部地区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苻国(斯瓦特)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分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此外,西藏“南部的尼婆罗和北部的于阗很早就同吐蕃建立了关系,并且都以其古老的佛教文明在吐蕃的艺术和宗教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①。早在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已有来自西藏的麝香,关于这些麝香到达罗马的途径,一般认为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商人将其从西藏贩运到印度,再经中亚销至罗马帝国,

^① [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或者通过青海柴达木盆地或西宁北上,经河西走廊、新疆到达罗马帝国。据史料记载,苏毗(又称女国)“东接土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①,其国“出鎗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②。在古代,吐蕃麝香是直接从青藏高原运往波斯或大食的。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在西突厥和唃哒人或者此前的贵霜人或大月氏人统治时代,伊朗人就通过迦湿弥罗或于阗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先民们保持者密切联系。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大月氏人或贵霜人可能已经懂得麝香的用途。公元6世纪时,波斯人已非常熟悉吐蕃的麝香。波斯人“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酊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袄”^③。在净礼中使用麝香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摩尼教和祆教创立时期,而波斯和帕米尔高原一带是不产麝香的。正如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所说:“无可怀疑的是,西藏(特别是西藏西部)在早期就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这可能是出于迁徙和贸易的原因,艺术及装饰主题,也随之从伊朗传入西藏。”^④

象雄(又称羊同、香雄)位于今西藏西部阿里一带,分为上象雄(即小羊同)和下象雄(即大羊同)。《唐会要》云:“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⑤象雄北接突厥是吐蕃人固有的观念。据说囊日伦赞就曾“战胜了汉人和突厥,从北方得到了食盐”^⑥。吐蕃兴起前,青藏高原各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隋书·裴矩传》记载: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胡商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⑦。644年,吐蕃在征服羊同后,在与突厥边界上设置了大羊同五东岱。^⑧杜齐认为:“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或宁可称

①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4,“婆罗吸摩补罗等二国”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9页。参见《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二》;《唐会要》卷99,大羊同国条。

② 《隋书》卷83《西域·女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50~1851页。

③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波斯》,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8页。

④ [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笏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99,大羊同国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70页。

⑥ 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⑦ 《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78页。

⑧ 巴俄·祖拉程哇:《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为部落联盟),但当吐蕃帝国开始向外扩张时,他便注定地屈服了。象雄与印度喜马拉雅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伸延到巴提尔斯坦(巴基斯坦)及和阗,并且把势力扩展到羌塘高原。总之,包括了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①象雄王国以其便利的地理与交通条件,沟通了青藏高原与外界的联系。在整个西藏早期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受古代波斯文化影响的痕迹。苏毗地处青藏高原北部,接近当时世界商业通道。苏毗很早便参与了西域各国和印度的贸易,以沙金换取各种日用品,故其经济、文化在青藏高原诸部中最为发达。

7世纪初叶,在青藏高原上以逻些(今西藏拉萨市)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吐蕃。吐蕃王朝的建立在东起川西、云南,南至不丹、尼泊尔,西从拉达克、巴基斯坦,北到甘肃、青海、西域的广大区域内,为从事游牧、农耕、狩猎以及商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交往的舞台。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超越语言、文化乃至人种的差异,互通有无,往来频繁。随着对外交通的延伸,西藏不仅成为麝香、金、银、宝石、药材、牦牛尾、羊、马、皮毛等土特产品的输出地,而且汲取各种先进文化,接受外来商品,成为当时国际贸易中坚实的一环。吐蕃与唐朝在河西地区的较量,在中亚与大食的角逐,本身就具有商业目的。

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波斯萨珊王朝的覆灭以及西方突然出现的变化,在吐蕃史籍中留下了一个相当含糊的地名——大食(Stag gzig)。藏文史籍《苯教史》载:苯教教义“从大食的俄茂林传到印度、汉地和象雄。再从这几个地方传到西藏,因此是‘三重传递’(三变)”。在苯教史后期著作中也多认为,苯教的起源地是辛饶米沃的诞生地 Stag gzig。而对于“Stag gzig”一词,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石泰安认为:“它大致系指伊朗,而常常又与‘拂林’(Khrom 或 phrom,在东伊朗语中作 Horm 或 Form)相混淆,后者开始是指拜占庭,到了10世纪时又指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在伊朗,强大的萨珊王朝于7世纪在大食人的攻击下已崩溃。这些人不久就占领了不花刺(布哈拉)和康国(撒马尔罕)、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的疆围。他们的汉文名称‘大食’(古代发音为 Tasig)来自塔吉克(Tajik)的伊朗居民,后来

^① 参阅杜齐《尼泊尔两次科学考察报告》,第十章象雄及其扩张;第十二章象雄;第十三章西藏西部历史调查,罗马,1956年版。